

政治与行政管理研究

## 国会研究：美国研究的新支点

孙哲 王义桅 赵可金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 美国国会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冷战结束以后,国会在美国对外政策,包括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把握美国国会及美国国内政治,成为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研究的重中之重。本文系统地总结了美国学者对国会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对美国国会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分析当代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发展的两个角度与分析方法,以期为我国的国会学与美国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见解。

[关键词] 美国国会 中美关系 国会研究 美国研究

[中图分类号] D772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2)02-078-009

### U. S. Research on : New Pivot Point of American Studies

Sun Zhe Wang Yi-wei Zhao Ke-jin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e U. S. Congress is the core of the U. S. political system.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Congress has been influenc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greatly, including Sino-U. S. relation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studies on U. S. Congress and American domestic politic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American studies and studies on Sino-U. S. relat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framework of studies on U. S. Congress and Sino-U. S. relations by analyzing systematically the Congressional studies in America and China.

**Key Words:** U. S. Congress, Sino-U. S.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studies, American studies

我国首次“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6月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行。来自政府与学界的专家学者分别就“国会与中美关系的历史”、“国会与中美关系问题:台湾、人权、经贸”、“有效的游说:中国对美国国会工作的反思”、“国会对华政策:媒体、公共舆论的影响”等四个专题进行了研讨,为改善中美关系提出了有价值的对策和建议。本次研讨会既是对以往我国研究美国国会成果的总结,又是结合实践发展迫切需要而展开集体攻关的开端。本文就是在归纳与会学者的重要观点、并对国内外学者以往研究成果进行整理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希望找出我国对美国国会研究的问题所在及未来研究的方向和可兹借鉴的方法,供今后更好地开展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研究参考。

### 一、国会研究：“美国学”中长期被忽视的重要课题

美国宪法将国会置于首要地位,开篇即论国会的职能。威尔逊认为,“宪法的形式是一个经过

[收稿日期] 2001-12-20

[作者简介] 孙哲(1966—)男,北京市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暨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王义桅(1971—)男,江西九江人,国际关系学博士,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

赵可金(1975—)男,山东省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

精心调整的、理想的平衡体,而当今我国政府的实际结构只不过是国会至高无上的一种体制<sup>[1-p8]</sup>;国会政体才是“联邦的真正政体”<sup>[1-p32]</sup>。时至今日,国会仍然被视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尽管其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与总统权力的消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sup>[2-p3~39]</sup>长期以来,作为美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会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开发。

作为一个分权体制的三足之一鼎,国会既是联邦和州政府关系的整合地带,又是政党、利益集团、公众舆论、文官体制和外国政府说客的权力竞技场。由于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是机构分离而功能重叠的综合体,国会不仅是立法机构,而且对行政、司法都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只有把国会放到美国政府的整体架构和系统运转中把握,才能真正体会美国国会在美国政治及美国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国会是美国公众监督政府及日常政治运作的最有效和最有力的渠道,研究国会成为全面把握美国社会的重要途径。如果光同行政部门打交道,是无法理解美国各州情况及其社会本质的。国会作为美国社会政治利益表达的合法场所,几乎所有的政治诉求都可以从国会运作中窥视踪迹;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国会就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政治缩影。因此,可以说,不了解国会,就不了解美国社会,就不了解美国的联邦制,不了解美国何以为美国,也就不能真正把握中美关系的未来。

从国家与政府的关系看,研究国会也为更好地理解政府行为提供了重要基础。总统的行为往往要通过其与国会的关系才能明了,否则会将美国总统误解为“帝王般的总统”。国会对总统形成方方面面的制约,但相互之间又不乏亲密配合,这构成了美国特色的政治画卷。比如在美国对华关系,尤其是台湾问题上,就可以清楚地觉察到国会外交与美国价值观念的份量。1979年,在中美刚建交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以立法的形式将中国内政问题列入美国政治生活,为美干涉我内政提供合法性依据。当时,我们有些同志感到既气愤,又不可思议,质问“美国到底谁说了算?”其实,这是一种不了解美国政治的表现。

的确,对美国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不仅我们常常有误解或忽视的地方,即便西方国家中不同于美国总统制政体的议会制国家,照样存有不理解和不适应的问题;美国政治的独特体制,的确让不少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即便是对美国“政府”概念的理解也有偏差。美国人说的“政府”(government)指的是“整个政体,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按照美国人的设想,政府三大部门(branches)是有意识地分立的,每个部门与其它部门相互制衡。”<sup>[3]</sup>“国会”则往往称为“The Capitol”、“Congress”、“Legislature”,甚至以“Senate”或“House”代称,但涵义各有侧重。

“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而非“中国人的美国”或“中国人理解的美国”,这句话成为长期以来美国人对误解美国的中国人所用的口头禅。不理解国会是导致对美国的认识产生偏差的最重要原因。要深入开展美国研究和中美关系研究,“就需要深入地研究美国国会,研究它的内部各种力量的关系和它与行政机关之间复杂微妙的互动。”<sup>[4]</sup>

## 二、美国学者的国会研究:视角与启示

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构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政治画卷,而美国政治体系中最复杂、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其国会制度。国会视角成为美国学者认识美国政治的综合平台。因此,国会研究成为美国“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美国学者所重视,其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与俱进、

---

“The Capitol”(国会山)是国会机构的代名词,媒体中较常用;“Congress”(国会),强调组织,着眼于第九届;“Legislature”(立法机构)强调功能,较抽象,为学者所广泛使用;而“Senate”(参议院)、“House”(众议院)强调国会两院,(house有时也笼统指国会)。

精彩纷呈。可以说,国会和立法研究在美国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分支,国会参众两院及国会图书馆设有研究部门和完整丰富的数据资料(包括独立的信息检索库),一般大学都在政治科学系设置了美国国会的相关课程。常青藤高校和著名的思想库的馆藏图书资料中国会研究宏篇巨著,长文短论,不一而足。

概括起来,美国学者对国会的研究,从大的方面讲有宪政视角、结构—功能视角、政策视角、政党视角、文化视角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领域:

(1) 政策领域:人们探讨为什么一定的议案在国会最终变成法律,以理解立法之意图或估算下一步通过类似主题法案的可能。

(2) 决策领域:更具体的是将国会视为在众多领域政策制定的机构。人们对国会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国会是政治权力集中和实践的场所。

(3) 代议制机构领域:人们将国会作为考察公众及其选出的代表间关系互动的焦点。

(4) 规则领域:学者们关注国会运作的正式规则,考察规则是如何影响结果的。“国会作为一种制度的本质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他们想应用组织理论的观点于公共机关。”<sup>[5]</sup>

美国各阶段国会研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概括如下:<sup>[6]</sup>

第一阶段,早期的国会研究传统。

19世纪前,国会研究者关注制度与国会规则,研读文献,解释国会如何起作用的等等。但国会实际运作并非如其一般程序规定的那样机械,于是人们的眼光又投向了国会的实际操作上。这样,在19世纪末,学者们发展了两种新的经验分析方法,即描述性传统与国会唱票记录分析(analysis of the roll call record of legislature)。

第二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国会研究。

第一时期的国会被称为“教科书式的国会”(textbook Congress),因为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关于国会的描述成为政治学教科书中对其正常运作的描述基础。国会由资深委员会主席把持,他们大部分是来自南方的民主党人,比政党领导或高级议员都要有权力。通过一项议案的过程常常是循规蹈矩的,使教科书更容易来描述权力的集中和议案通过过程。同时,这一时期也是科学行为主义及后来发展出来的理性选择学派蓬勃发展的时期。常用的国会研究方法有:

(1) 行为研究(behavioral studies):包括个案研究(case studies)、唱票研究(roll call analysis)、访谈研究(interview studies)。个案研究主要考察个案如何反映整体,唱票研究关注如何解释投票行为,访谈研究是设计问题走访议员;

(2) 规范理论(formal theory):规范理论开始于投票与委员会的社会选择理论,着眼于分析投票行为、议程、联盟等;

(3) 比较国会研究(comparative legislative studies):尤其是“次国家研究”(subnational research)与“历史纬度”(historical dimension)两种类型。其中对四个国家的代表研究是比较国会研究的早期代表。<sup>[7]</sup>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国会研究。

70年代的国会被称为“改革的国会”(reform Congress)。这一时期,当北方的民主党改革者改变了国会规则,把更多的权力赋予小委员会(subcommittees)而削弱了委员会主席的权力,教科书国会的权力关系被动摇。<sup>[8]</sup>其结果是增强了国会中的个人主义,赋予单个国会议员更大权力。

(1) 行为研究:包括唱票研究、个案研究、访谈与观察研究(interview and observation studies)。值得一提的是访谈方法由于参与者观察方法的运用而得以增强;

(2)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戴维·梅休等发现,国会的运作基于一个简单的目标,那就是议员的连任。<sup>[9]</sup>国会作为政治行为者追求其自身目标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是我们观察国会作用的重要视角：

(3) 新数据源(new data sources) :包括国会委员会、1971年的联邦选举法案及1974年的修正案、集合选举结果、1978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的调查。

第四阶段,20世纪80及90年代的国会研究。

这一时期的国会被称为“后改革时期国会”(post-reform Congress)。70年代的国会改革作用于体制,当众议院议长的作用得以加强,政党政治同时得以强化时,国会中的权力关系再一次调整。<sup>[10]</sup>这一时期盛行的“分治政府”及1994年国会选举中共和党40年来第一次重新获得主导权这两项国会重要变化,也导致了这一时期的国会更关注于规则与政党的角色而非个别议员。

(1) 行为研究各方法,如个案研究、唱票研究、访谈研究,仍然得以推行；

(2) 新制度主义(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如80年代后期兴起的研究国会制度安排的变化与国会中的不完全信息问题；<sup>[11]</sup>

(3) 历史数据(historical data) :研究国会规则与制度在历史上的变化；

(4) 分治政府(divided government) :即一个政党控制了白宫而反对党控制了国会中的一院或二院。在此之前,很少有研究这一问题的专论,这也是研究政党体制在国会政体中作用的重要环节。

总之,美国的国会研究既与国会本身的变迁有关,又与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关联。反观中国对美国国会的研究,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刚刚起步。美国学者研究国会的方法与视角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尤其是要把国会当作“自组织”来研究,研究时要不断创新,多视角,从交叉学科角度深化力度。

### 三、中国对美国国会的研究:问题与现状

中国对美国国会的研究目前相当薄弱。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的制约,加上长期偏见和忽视的缘故,科学的、客观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概括起来,中国(主要是大陆)对美国国会的认识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见表一。

前阶段总体上是常识性、介绍性为主,谈美国政治的多,对国会的研究不够,偶尔涉及也缺少理论性、系统性。突出的问题有两方面的,一是难以摆脱“自我”的束缚,主观因素较浓,如国会与总统“唱双簧”的提法,是不完全了解美国政治的表现;二是难以摆脱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一“中国情结”突出地表现在对美国国会抱有抵触情绪,认为国会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往往扮演负面角色而从心底里厌恶之,所谓“反华议员”这种贴标签式的提法即是明证。此外,“刺激—反应”模式仍然存在,如强调单一跟踪某些与中国有关的法案情况,而未能整体把握国会运作。

追溯起来,以往对美国国会的考量是从世界历史,尤其是美国史、国际关系史个案研究开始的。对国会本身的研究从属于比较政治制度范畴。

令人欣慰的是,在以往《美国研究参考资料》对国会机构的介绍及美国驻华使馆《交流》杂志对国会运作的介绍基础上,中国学者近年来对利益集团、游说、总统与国会关系、国会外交、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等众多领域展开了较深入的分析,形成了国会学的某种气氛。值得一提的是,威尔逊《国会政体》的翻译唤起了人们对委员会制度的关注,蒋劲松的《美国国会史》及孙哲的

如王勇：“试论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影响：以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政策为例”，《美国研究》1998年第2期。

如熊志勇：“简析对美国国会的游说：以美国对外政策为例”，《美国研究》1998年第3期。

如袁征：“总统游说与国会决策”，《美国研究》2001年第3期。

周敦仁：“美国总统与国会”，《复旦学报》1990年第1期。

刘永涛：“90年代美国国会与总统关系的变化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01年第3期。

如孙哲：“总统外交与国会外交”，《复旦学报》2001年第4期。

如郑永平：“树欲静而风不止：近年来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美国研究》1991年第4期。

《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和与非的《美国国会》等专著的相继出版,标志着中国对美国国会的理解进入较为客观、深入的阶段,有了质的飞跃。

相比大陆而言,台湾对美国国会的研究一直走在大陆的前面,其中一重要标志就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罗志渊即出版了《美国国会立法程序研究》这样有份量的著作;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发表了大量有关美国国会的专著与论文(见表二)。

#### 四、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研究:方向与方法

根据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分析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首先要把握好研究方向,也就是确立一定的分析框架,然后应就所选方向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

##### 分析框架:两个视角,五大议题

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当代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发展,可以从两个角度切入:第一个角度是按时间序列的界定,将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成几个重要阶段,根据每一个阶段中美关系发展总的特点,探讨美国国会介入美国对华政策的机制、影响、以及个案行为上的特征。总体上来看,按照中美关系发展的总体状况,具体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1) 全面对抗(1949—1972)。当时政治上的敌视状态不仅造成双方在朝鲜和越南战争中军事交手,而且在经济上也断绝了一切往来,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

(2) 解冻建交(1972—1979)。1972年尼克松访华,签署了著名的“上海公报”,中美由此结束对抗并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3) 正常化交往(1979—1989)。1979年2月邓小平对美国的历史性的访问,揭开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新篇章。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两国在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开始了广泛和富有成效的合作。

(4) 重重危机(1989—1996)。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发生了严重倒退和恶化。在最困难时刻,中国依然坚持“斗而不破”的对美政策;美国也提出“全面接触”的政策调整,希望把人权、贸易问题脱钩。但是1995年美国公然违反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允许李登辉访美,使中国被迫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中美关系也降至建交后的最低点。

(5) 风波迭起(1996—2001)。为了处理危机,1996年以后中美之间高层接触增加,两国关系在江泽民和克林顿互访后大有改善。但也就是这个阶段,美国对中国的综合国力作出了重新的评判,提出了“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这样大型的结构性的理论。对此,中国坚持自己“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沉着应付,从容应对,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在坚持历史阶段分析的基础上,与此对应,每一个阶段中,都有不同的案例可以研究,比如中美建交之前的《富布赖特报告》,建交之后的《与台湾关系法》,90年代的《加强台湾安全法案》等,这些都是美国国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原始文本,也是中美关系发生逆转的历史见证。只有将这些案例进行深入的研究,清晰的认知,才能摸到中美关系跳动的脉搏,才能把握中美发展的大局。

另一个角度是从观念角度切入,把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发展当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概括成为几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议题,研究这些议题的来龙去脉,分析它们的发展演变,把握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思想律动。总结起来,我们认为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发展当中值得长期开发的重大议题主要有五个:

第一,人权问题上的对抗与对话。

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曾自豪地宣称:只要自由和独立的原则还在

---

罗志渊:《美国国会立法程序研究》,正中书局印行1961年版。

被奉行,就有美国心脏的跳动。自立国之日起,美国就把自己当作是“自由的灯塔”;20世纪90年代更是制定了“民主扩展战略”以取代原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在美国人眼里,中国是一个“践踏人权”的国家,自然成为美国“圣战者”们的“征伐对象”。国务院、国会每年还要就中国在政治自由、堕胎、监狱劳动、童工、西藏等“人权问题”展开讨论、听证、并公布年度报告,试图将其与贸易、安全等问题进行各种形式的挂钩,对中国进行“孤立和惩罚”。人权问题上的争论,将是国会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长期性因素。

第二,“经济型政治”(econopolitik)驱动下的贸易争端。

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之间的经贸交往定会获得十分快速的发展。伴随着经贸交流范围的扩大,中美之间经济摩擦的频率和程度将呈现上升趋势。总体来看,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主要发生在以下几个领域:关于最惠国待遇地位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问题、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争论等等。尤其是知识产权问题,在以往,美国曾数次对中国进行特别301条款调查,以中国违反知识产权为由列出报复清单。而中国则在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产权法、商标法、版权法和其它相关法律,并付诸实施。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之间在经贸问题上的争论将会长期持续下去,而在美国处理贸易争端、制定贸易政策的主要行为体就是国会,因此国会在经贸问题上的作用必然会与日俱增。

第三,中国的崛起和地区安全问题。

美国对中国可能成为其战略对手一直存有戒心,面对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美国深感中国作为拥有核武的军事强国,可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出于这种考虑,有关“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在中美安全关系中被反复协商。例如,美国多次指责中国向国际敏感地区出售或转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技术。实际上,中国在地区和全球性不扩散问题上一贯采取负责的态度。1992年,中国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NPT),1995年续约。1996年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并与美国等国家合作,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ITBT)得以通过。但是,作为更多地客观上以“挑战者”面目出现的中国,必然会引起美国人的警惕和戒心,国会的作用也必然在这些问题上体现出来。

第四,最重要、最敏感、同时也最容易引发中美直接冲突的台湾问题。

美国一直把台湾政权看成是对中共合法性的挑战。“两党轮替”在台湾的出现,又使美国认定台湾正在进行“民主转型”,从而加大了与台湾官方交往的力度,包括提高对台军售的数量和质量。中国对台湾当局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的模糊和“务实外交”策略,不仅提出了种种批评,同时还严正指出:为防止台湾独立和外国势力对台湾的军事干涉,中国政府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应当说,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双方都十分警惕,都具有比较高的脆弱性,有人称之为“中美关系潜在的爆炸点”并非夸张。事实上,人们往往忽视的是,国会在台湾问题上的作用要比人们想象的都要大,必须引起人们的长期关注。

第五,双方各自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

中美两国围绕人权、经贸、安全和台湾问题产生的冲突,直接导致彼此国家形象的变形与走样。最让人迷惘的一个结果是,中美两国几经周折后彼此误解依然太多,以致于时至今日,中美关系自1979年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首次出现了领导保持冷静而中国公众观点趋向激烈的现象。具体而言,很多美国人要么把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社会的下一只亚洲虎和可以给美国公司和工人提供经济机会的巨大源泉,要么把它视为世界上最后一条共产党巨龙,是对自由和安全构成的下一个巨大威胁。而在中国,众口一词的言论背后也同样出现了“中国可以说不”的反美情绪,中国对美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充满了较为激进的辩论。因此,双方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关乎两国关系发展的长远大计。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中美关系肯定会是持续不和谐的音符。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国会是一个最好的切入点。

## 分析方法：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为更好地开展对美国国会的研究，首先要避免重蹈覆辙，摈弃种种错误认识，如国会与总统“唱双簧”、“美国政党无足轻重”、所谓“反华议员”等等，并纠正谈国会总绕不开中美关系等既定思维模式，公正、客观而科学地分析、理解美国国会的程序及运作。而要做到这一点，笔者以为，以下方面值得中国国会研究者注意：

### 第一，结构—功能分析。

(1) 国会程序研究：特别关注规则委员会，尤其是众议院规则委员会的作用机制。

(2) 委员会研究：美国学者对国会委员会作用寄予高度评价：“国会里的那些委员会被描述成‘国会的神经末梢——资料的收集者、备选方案筛选者和法律条文推敲者’。他们甄别哪些可以接受，哪些不行，并修改余下的任何议案。”<sup>[12]</sup>有人说，“国会开会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国会在委员会的房间里才正式工作”。威尔逊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太多脱离现实。”<sup>[13]</sup>还有学者指出：“美国国会委员会制度基本特点的形成有赖于两项基本条件——三权分立的政体和权力分散的、自由的政党体制。”<sup>[14]</sup>因此，国会委员会研究必须结合政党体制研究。

(3) 国会体制中的政党作用研究：研究政党在国会运作中的作用为重新认识美国政党提供了最好的视角：“美国两大政党庞大、散漫，各种意识形态汇聚一体而又各行其是，党员不认为有必要按照党领袖的要求去投票。事实上，多数议员作为独立的创业人进入国会，只有当他们认为有关政策没有违背其选民的意图和利益时，他们才会遵循党的政策。”<sup>[15]</sup>

(4) 国会外交：除其本身的重要意义外，国会外交研究是国会与中美关系研究及探讨国会与总统之间制衡与合作关系的重要媒介。因此，未来中国的国会研究应该拓展至总统研究领域，以展开相互配合、深化之势。

(5) 国会—总统关系研究：一方面，国会与总统关系是观察美国政治天气的“晴雨表”；另一方面，总统与国会之间存在权力分配的不明确（重叠）之处，即所谓“半阴影区”（twilight zone）。尤其是在外交领域，国会与总统间存在的“半阴影区”的张力<sup>[5-24-63]</sup>，往往成为开展对美工作的突破口和观察美国式民主的重要窗口。

(6) 国会内部制衡：除国会与总统关系外，国会两院本身的合作与制衡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但这个问题与国会与最高法院的关系一道，长期被中国学者所忽视。为此，中国应该重视“分治政府”的研究；将来有条件，应该独立开展参议院研究与众议院研究，而不是笼统称美国国会研究。

(7) 国会与具体的美国政策：如能源、安全、军事、移民、贸易政策等，有的虽不与中国直接相关，或不专门针对中国，但可能会与中国有关联。为此要从长计议，全面研究美国国内政治。

(8) 利益集团研究、国会助理、国会附属机构的研究以及国会文化研究等，尤其是国会如何塑造政治舆论，影响美国的意识形态（反之亦然）。

### 第二，个案分析：历史回顾与现实跟踪。

“教科书”式的国会是一回事，国会实际运作又另当别论。为此，国会研究必须结合实际，开展个案研究。如国会与两岸关系、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等等。根据领域之不同，可以结合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等不同理论进行客观分析。

### 第三，美国整体视野下的国会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分析考量。

以上研究，单独看都是十分重要的，但仍有孤立、片面之嫌，必须注意以整体视角（历史的、现实的）来加以校正，否则便不全面。这也回应了本文开篇提及的国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重要地位的论述。国会研究只是作为一个典型平台来研究美国，其目的是为了理解美国、把握美国，更好地开展对美工作。美国政治与社会既是国会研究的起点，又是归宿，要避免“为国会而国会”的倾向，时刻

注意以整体美国观来考察美国国会。

为此,从长远来看,要研究好美国国会,就必须考察美国整个社会,包括各州情况、选区划分、人口变动、宗教信仰、经济发展、军事设施分布、军工企业在各州的情况,它们是制约议员们投票的背后动因。

综合以上论述,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课题研究需要对中美两国的内政和外交做一详细的比较。要全面分析中美关系的未来,国会研究应该成为美国研究中的“重中之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对美国国会及美国国内政治的日益重视和研究的日益深入,我国的美国学与中美关系研究将迈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附表:

表一 中国大陆研究美国国会文献综述

	着眼点	代表作	代表人物	文献数		译作
				书	论文	
阶段 附属阶段 (1990's 中期)	美国历史	《美国通史丛书》	杨生茂 刘绪贻	9	100	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
	美国政治体制	《美国政府与政治》	李道揆	5	56	麦迪逊等:《联邦党人文集》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伯恩斯等:《民治政府》
	美国宪法	《美国宪法史稿》	李昌道 黄绍湘	7	49	巴伦等:《美国宪法概论》
阶段 了解阶段 (1990's 中期~2000's)	国会体制	《美国国会与美国外交政策》	汪 熙	2	31	威尔逊:《国会政体》
	国会史	《美国国会史》	蒋劲松	2		
	议员、议案、利益集团及其他	《利益集团与美国政治》	李寿祺	7	34	奥恩斯坦、埃尔德:《利益集团、院外活动与政策制定》
阶段 研究阶段 (2000's ~ )	美国国会:制度及运作	《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美国国会》	孙 哲 与 非	4	14	梅休:《事关选举:美国国会的政治解读》(蒋昌建译)
	国会外交解读 国会与美国政策	《美国国会对外政策》、《国会外交》、《应对未来:美国国会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	孙 哲 刘永涛 王义桅	7	11	林赛:《国会和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赵可金、张佳译,待出)
	国会游说	《美国国会游说与公共外交》	赵可金	1	3	沃尔普:《游说国会:政治体制如何运作》(赵可金译)

由于篇幅所限,表中所列为代表性著述,难以函盖全部著作与代表人物。

根据《美国研究》、《美国研究参考资料》等杂志粗略统计。

不包括专题史。

美籍华人学者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 美国宪法》是近年来的代表作。

表二 台湾学者近年对美国国会的研究

成果 着眼点	年份	代表作	代表人物	年份	译作
制度研究	1982	《美国政府与国会》	杨日旭	1991	《美国国会要略》,(李国雄译)
	1991	《美国国会:制度与运作》	郑哲民	1991	《权力游戏》,(时报文化公司译)
	1993	《当代美国政治论衡》	王国璋		
	1994	《国会制度解读:国会权力游戏手册》	陈淞山	1995	Larry Elowitz《美国政府与政治》
经验研究	1987	“国会监督与政策的执行 - 美国经验之研究并兼论我国的发展”	施能杰		
	1998	“中美关系专题研究:1995—1997”	林正义	1994	David C. Kozak, John D. Macartney《权力游戏规则 - 国会与公共政策》,(詹中原译)
个案研究	1993	“美国续予中共最惠国待遇问题:府院之争个案研究,1990—1992”	裘兆琳		
	1998	“1995—1996年台海危机:美国国会的反映”	林正义		

## [参 考 文 献]

- [ 1 ] (美)威尔逊: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页.
- [ 2 ] 参见孙哲.《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 [ 3 ] (美)沃尔特·克拉维茨.国会的运转[A].交流,1993,1.
- [ 4 ] 与非.美国国会[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李道豫序).
- [ 5 ] Herbert F. Weisberg, Eric S. Heberg, Lis M. Campoli, *Classics in Congressional Politics*, Longman 1999, p3.
- [ 6 ] Ibid, pp. 1—19.
- [ 7 ] John C. Wahlke, et. al. *The Legislative System*. New York: Wiley, 1962.
- [ 8 ] See Leroy N. Rieselbach, *Congressional Reform in the Seventies*,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1977; —ed., *Legislative Reform: the Policy Impact*,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78.
- [ 9 ] David Mayhew, *Congress: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 10 ] Roger H. Davidson, *The Postreform Congres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 [ 11 ] Kenneth A. Shepsle and Barry R. Weingast., *Positive Theories of Congressional Institu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 [ 12 ] 克拉维茨.国会的运转[A].交流,1993,1.
- [ 13 ] 威尔逊.国会政体[M].第46页.
- [ 14 ] 克拉维茨.国会的运转[A].交流,1993,1.
- [ 15 ] (美)路易斯·亨金.[M]邓正来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三联书店1996.

[责任编辑 王 群]